

贺羽的面相和身材酷似母亲杨秀英女士，那是一位教子有方，妥妥的东方女性，眼睛则像父亲——湘籍著名画家贺安成先生。他的眼睛不是特别大，但眼珠乌黑发亮，眸子流转，如同摄影成像的快门，被他盯着，有被电光掠过的感觉，我有过两次亲身体会。

第一次是1985年8月，时当盛夏，株洲宾馆空调室内凉风习习。全国著名金石书画家李立先生和高足贺安成先生正在联袂创作一幅国画。这天，十四岁的翩翩少年贺羽也被父亲领着拜见师爷。见到贺羽当场制作的十二生肖泥塑作品后，李立先生连声称赞：“黄泥可塑，孺子可教也。”

贺羽当时就有画坛神童之称，作为旁观者，我也知道他未来可期。于是，便请他为我画幅速写。那时的贺羽有求必应。待我坐定后，他一边用早熟的慧眼在我身上不断打量、扫描；一边抿着小嘴，用铅笔精心勾勒我的体貌特征。不到十分钟，便一气呵成。画毕，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等他日后成为大画家，再请他为我画一幅。贺羽满脸稚气，笑而不答。旋即又用铅笔题写“贺羽，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的落款。

虽然这只是他一幅早期作品，但我一直作为“真迹”精心收藏，期待他为我重挥大笔的那一天。遗憾的是，自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忙碌的身影，但也不断分享过他事业成功的欢乐，先是他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革命先辈孙中山先生敬绘巨幅画像，后又晋升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成为博士生导师，早两年又挂职锻炼，担任新疆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

第二次见到贺羽，是在三十九年后。那天，他专程前来参加“株洲情缘——贺安成书画艺术展”开幕式。在被拥挤的人群中见到他后，我直奔主题，掏出他当年的大作，请他在方便之时，为我再画一幅肖像，作为拙诗诗集插图之用。也许是父亲打过招呼，他满口答应，二话不说，把我带到一个较为清静的小地方，立马进入工作状态。当他的目光再次聚焦于我时，分明感到他的眼神更老辣，更锐利，更有穿透力。离开开幕式只有半个钟头，偏偏他的一些发小和同学也闻讯而至，其间，时不时还要接听电话，他都极为简短的语言礼节性地应答。他的目光一直盯着我，手中的画笔一刻不停，灵动自如地挥洒，听得到纸上轻微的笔触声。开幕式前，在围观者一片啧啧称赞声中，一幅惟妙惟肖的素描肖像终于大功告成。临了，他还客气地题写了“李学拯平老师于株洲，贺羽，2024年1月16日”的落款，似乎是对当年没有文字约定的践约。

贺羽传神的眼睛和传神的画笔，已经创作出一批又一批令人称道的传神之作。热切期盼这位湘江江水长大的株洲籍著名画家，用那双如炬的慧眼，为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创作出更多的传神甚至传世的精品力作。



作者与贺羽(右)合影。罗伯平摄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六〇一厂厂门

## 地名记忆

## 茨菇塘，那时烟火

欧阳光宇

在株洲市荷塘区西南，有个叫茨菇塘的街道，上世纪70年代中至90年代末，我家就住在那里。

想来这地方最初是大片长着茨菇的水塘，但我从小到大没在这里看过水生的茨菇，据网友黄敦霖回忆，上世纪60年代，茨菇塘和新月塘的搭界处，即现在名为钻石路的地方，有一口长着茨菇的水塘，里面还有茭瓜。他们做孩童时，曾在那口塘里捉过黄鳝、泥鳅，还钓过鲫鱼。

那时的茨菇塘，是一个工业气息和烟火气交织在一起的地方。

工业气息以六〇一厂为焦点向周边弥散。

我家开始住的地方叫干搭屋，是一栋小型政教培训楼改成的职工宿舍，一间间住房原是小教室，虽然条件简陋，面积却并不显得局促逼仄。干搭屋北面，穿过一个防空洞(隧道)，便到了六〇一厂的生活区。最开始那个防空洞比较低矮阴暗，手摸在洞壁上感到湿乎乎的，在这么一个情境里，却让我想到《天方夜谭》里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觉得这是个宝藏洞，可以藏宝，而我那时的“宝藏”，除了书包，还是书包。

到了上世纪80年代，这个防空洞鸟枪换炮了，洞的长宽高得以拓展，全部用钢筋水泥固化一新，顶上的照明灯也装得整整齐齐，整个防空洞已非从前那样阴暗潮湿。或许是年岁渐长，又或许是洞内灯光通明，我原来那些有关宝藏的联想，此时已荡然无存。

无形中，六〇一厂周边集结了一大批厂矿子弟，父母工作的工厂背景也成了他们原生家庭的一部分，这些厂矿子弟的语言、见识和玩耍的东西，多多少少带有工

厂的意味，灯光球场、露天电影这一类儿时玩乐的标配就不说了。手作方面，弹子盘车是那时男生玩的最大样的玩具，用废旧的滚珠轴承(俗称弹子盘)做车轮，将其安装在木板底下，前一后四，前一个支撑可以转动的“方向盘”，后四个支撑“车身”，一个或两个男生，手脚并用，坐着弹子盘车绕弯下坡而下，是我儿时看到的最酷的游戏场景。

女生也自制玩具，用一个小花片大小的环形金属垫片，将等长的麻绳绕织一圈，织成一个毽子，然后几个女生用数教的方式比踢毽子，看谁踢的多，似乎个个都是高手，每人都能踢几十上百个。

踢毽子是一样，跳房子又是另一样。跳房子的玩具最容易做，用一根半尺长的绳子，穿七、八个算盘珠子，扎紧绳子两头做成珠串，这就是跳房子的玩具。把珠串丢进事先用粉笔画好的“房格”的第一格，小孩便一脚抬起一脚单立，做金鸡独立状，用单立的这只脚跳入“房格”，将珠串往前踢。跳房子的游戏会损耗鞋底，我至少有两双鞋子，就在这一跳一跳中磨穿了底。

弹子盘车、毽子、算盘珠串、沙包这一类东西的自制，小孩都可以完成，倒是滚铁环的铁环和手持的长柄铁钩，家里就有，可能是家长托厂里的钳工师傅做的，反正那时候都是自己动手，没有用钱买玩具的概念。

我感受到较多的茨菇塘的烟火气，除了通往月塘小学的路上流动商贩兜售的特色零食，便是荷叶塘一带串联的粮店、煤店、粉店、副食品店和菜市场了。

上学路上遇见的零食，有用竹制的米筒筒筒着卖的毛栗、板栗、“羊屎蛋”，三、五分钱买一筒，倒在小孩的口袋里，口袋

便鼓起来。其中尤以吃“羊屎蛋”最为夸张，这是一种暗紫色的浆果，味道酸酸甜甜的，吃在嘴里，满嘴都是紫色，株洲方言把“羊屎蛋”说成“羊屎饭”，这种紫色的果酱“饭”，课间15分钟不宜吃，因为上课铃一响，若被老师点到回答问题，这一张嘴，便露出满嘴紫色的牙齿，会给老师留下不好的印象。

还有与糖有关的校外路边零食，最常见的就是新糖和画糖了。在我看来，总觉得新糖没有画糖的技术含量高，新糖就是将一整团团结的白色糖块，用小锤敲打钎子，斩下一块包在草纸里，作价两分钱、三分钱地卖给小孩，而画糖的趣味性和技术性都高些。有一回放学路上，路经五中附近，只见有一帮学生在那里围观，我也忍不住探头进去，不经意便看到了惊诧的一幕，那是一位画糖师傅在制作一个立体花篮，只见他上下一拉，一个透明的篮筐便拉成了，糖制的篮筐，底下还有底，然后他又用糖画了一些带钩的花饰，挂在花篮四周，末了再用一根长竹签提着花篮半圆形的提手，交给那个转转盘、转中花篮的小孩，这小孩在我们艳羡的目光中，一脸兴奋地提篮而去。

放学后育才路走出来，往西走一站路，中途路过靠南的月塘菜市场巷口，便到了桥东饭店。夏天桥东饭店冷饮部的雪糕，成了那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毛钱一支的雪糕，是高于白糖和绿豆冰棒的高级冷饮，父母在周末带孩子来这里买雪糕吃，算得是一个家庭上乘的消费行为。

一眨眼，我搬离茨菇塘已二十多年，当年一起踢毽子、跳房子的小伙伴也散落在四方，午夜梦回，我还是会经常想起当年在茨菇塘的日日夜夜。



如今的茨菇塘街道，仍留有不少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修建的职工家属楼

真情

## 白棉纱上的灰手印

黄日蒸

在这寒冬腊月的日子里，我依然会在床上挂一顶老式的白棉纱蚊帐。

清晨，天刚蒙蒙亮，我醒了。微亮的晨光透过窗帘缝钻进房间，我睡眼朦胧地睁着眼睛，眼睛下意识地瞄向蚊帐的门口处，似乎想在白棉纱上找到奶奶的灰手印。我想奶奶了。

小时候，我跟随奶奶在农村老宅里生活。奶奶担心我会被蚊虫叮咬，即使在寒冷的冬日，也会为我挂上一顶蚊帐，奶奶给我挂上的蚊帐是她的嫁妆之一。奶奶在床的四个角都插上竹竿，用碎布条绑紧和固定，然后把蚊帐四个角的绳子绑在竹竿上，将蚊帐撑起来，像个白色的小帐篷。

每天早上，我都可以在蚊帐开口处的白棉纱上看到几道灰印，那是奶奶留下的手印。

奶奶每天都摸黑起床，点燃煤油灯，踏着微弱的光来到棚子里，为我煮早

餐。老家的灶台和主屋是分开的，建在院子的一角。简易的棚子没有门，棚内有两个由几块红砖堆成的简易灶，灶内残留着每日烧火留下的炭灰。墙边有一个用砖头砌成的简易石桌，棚子里还堆放着一捆捆干柴和一箩筐枯枝叶。奶奶用枯枝叶把干柴引燃，把早饭下锅。做早餐期间，奶奶会时不时地回主屋掀开蚊帐看看我、为我盖被子。

那是一个冬日的晚上，我发高烧了。奶奶顶着寒风，就着微弱的煤油灯光，到棚子里烧水和熬白米粥。忙活期间，奶奶还要时不时地回主屋照看我，生怕一时不察，我病情加重。那个寒冷的黑夜里，奶奶不知疲倦地来来回回穿梭在主屋和棚子之间。在屋内昏黄的灯光下，奶奶那双粗糙而布满茧子的手，一次又一次地不知疲倦地掀开蚊帐，断断续续地抚摸我的额头、脸、颈背、手和脚处。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看到蚊帐的门口处的白棉纱上灰黑一片。奶奶趴在床边的木桌上睡着了，桌上摆放着一个暖水瓶、一个保温饭盒、两个碗、勺子、一个里面放着毛巾的搪瓷脸盆和一些药。

奶奶被我起床的动静惊醒了，她担忧地再次用手探向我的额头和颈背，下意识地问我：“小宝感觉怎么样？还热不热？饿不饿？”我紧紧地抱着奶奶。奶奶张开双臂把我拥在怀里，用手轻拍我的背。奶奶的怀抱，给了我无限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温暖了我的整个童年。

长大后，不管是在大学宿舍里，还是在家里，一年四季，我的床上都会挂着一顶老式的白棉纱蚊帐。虽然再也不会在这白色的棉纱上出现奶奶的灰手印了，但每天在温暖着我，仿佛奶奶从未离开过。

真的又想你了，奶奶。